

北大中文文库

浦江清文选

《宫词》之作者虽难论定，但此类诗词，本属乐府性质，无作者之个性在内，故考明时代及内容所陈之史实，远比研究作者为重要也。

浦江清 著 / 张鸣 编选



浦
江
清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北大中文文库

浦江清文选

浦江清 著/张鸣 编选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浦江清文选/浦江清著;张鸣编选.一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2010.10

(北大中文文库)

ISBN 978-7-301-17834-8

I. ①浦… II. ①浦…②张… III. ①古典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
文集 IV. ①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9334 号

书 名: 浦江清文选

著作责任者: 浦江清 著 张 鸣 编选

责任编辑: 徐丹丽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7834-8/I · 2266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印刷者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17 印张 238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;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(代序)

随着时光流逝,前辈们渐行渐远,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;可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,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,那些上下求索、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,不但没有泯灭,反而变得日渐清晰。

为什么?道理很简单,距离太近,难辨清浊与高低;大风扬尘,剩下来的,方才是“真金子”。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,二十年后、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,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,很难说。作为读者,或许眼前浮云太厚,遮蔽了你我的视线;或许观察角度不对,限制了你我的眼光。借用鲁迅的话,“伟大也要有人懂”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、陈寅恪,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。在这个意义上,时间是最好的裁判,不管多厚的油彩,总会有剥落的时候,那时,什么是“生命之真”,何者为学术史上的“关键时刻”,方才一目了然。

当然,这里有个前提,那就是,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,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。十五年前,我写《与学者结缘》,提及“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‘阅读’,学者自然也不例外。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,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,实在是一种幸运”。所谓“结缘”,除了讨论学理是非,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。在我看来,与第一流学者——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“结缘”,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“捷径”。举例来说,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,多愿意与鲁迅“结缘”,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。

对于学生来说,与第一流学者的“结缘”是在课堂。他们直接面对、且日后追怀不已的,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“课程表”,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——20世纪中国的“大历史”、此时此地的“小环境”,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,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、变化莫测、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“文学课堂”。

如此说来，后人论及某某教授，只谈“学问”大小，而不关心其“教学”好坏，这其实是偏颇的。没有录音录像设备，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，黄节怎么深沉，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，所有这些，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“言说”。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，也无法完整地“重建现场”；但搜集、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，还是有助于我们“进入历史”。

时人谈论大学，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何为大师，除了学问渊深，还有人格魅力。记得鲁迅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先生的音容笑貌，还在目前，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”其实，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，走出校门，让你获益无穷、一辈子无法忘怀的，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，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，即所谓“先生的音容笑貌”是也。在我看来，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，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，才是最最要紧的。

除了井然有序、正襟危坐的“学术史”，那些隽永的学人“侧影”与学界“闲话”，同样值得珍惜。前者见其学养，后者显出精神，长短厚薄间，互相呼应，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“英雄本色”。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（系），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，若姚永朴、黄节、鲁迅、刘师培、吴梅、周作人、黄侃、钱玄同、沈兼士、刘文典、杨振声、胡适、刘半农、废名、孙楷第、罗常培、俞平伯、罗庸、唐兰、沈从文等（按生年排列，下同），这回就不说了，因其业绩广为人知；需要表彰的，是 1952 年院系调整后，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。因为，正是他们的努力，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将推出“北大中文文库”，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（游国恩、杨晦、王力、魏建功、袁家骅、岑麒祥、浦江清、吴组缃、林庚、高名凯、季镇淮、王瑶、周祖谟、阴法鲁、朱德熙、林焘、陈贻焮、徐通锵、金开诚、褚斌杰），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/研究生阅读的“文选”，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“对话”。此外，还将刊行《我们的师长》、《我们的学友》、《我们的五院》、《我们的青春》、《我们的园地》、《我们的诗文》等散文随笔集，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

典。也就是说,除了著述,还有课堂;除了教授,还有学生;除了学问,还有心情;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,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;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,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——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“大学生活”。

没错,学问乃天下之公器,可有了“师承”,有了“同窗之谊”,阅读传世佳作,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,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正因此,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、时深时浅,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,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作为弟子、作为后学、作为读者,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“结缘”,实在幸福。

陈平原

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前 言

浦江清先生是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、文史研究专家、教育家。先生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(今属上海市)。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外语系,主修西洋文学,辅修国文与哲学,1926年毕业,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,担任陈寅恪助手。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,任助教、讲师,讲授中国文学史。1933年与冯友兰同赴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游学。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,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,与朱自清等创办《国文月刊》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随清华大学迁回北京,任中文系教授。1948年代理中文系主任。1952年院系调整,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7年病故。

在20世纪学术史上,浦江清先生治学,以渊博精湛著称。他学贯中西,涉猎广泛,精通文史之学,兼擅诗词写作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手之后,受陈寅恪和王国维的影响,开始走上文史研究的学术道路。主要论文有:《八仙考》、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、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、《词的讲解》、《论小说》、《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》、《曲律与宫调》等。此外还有《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》、《苏德曼评传》、《殷虚甲骨之新发现》、《卢冀野五种曲》、《民俗学之曙光》、《法国名剧新译》、《先秦入声的收声问题》、《英国女诗人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》、《左芬墓志铭》、《逍遥游之话》、《屈原》、《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》等文史论文,以及《小小十年》、《千夜一夜》、《评陆侃如、冯沅君的〈中国诗史〉》、《评江著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〉》、《评王著〈元词斠律〉》、《朱自清先生传略》等学术评论。这些文章,广泛涉及古今中外中国文学、史学、考古、宗教、民俗、音乐、音韵、曲学、文化以及外国文学等学科范围,体现了浦江清先生学贯中西、渊博宏通、视野广阔的治学特点。

浦江清先生治学极为严谨,生平发表论文不多,但他的重要论文《八仙考》、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、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三篇,都是学术史上的名作,最能代表浦先生的学术造诣。

1936年发表的《八仙考》一文,材料宏富,考辨精深,解决了道教史、文学史、文化史上的一个纷繁复杂的疑难问题,刚一发表,就受到学界的极高评价,时至今日,此文仍被学界公认为研究“八仙”故事相关问题的最重要文献之一。

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一文,发表于1947年春。此文始作于1938年,1943年2月改订稿完成,因抗战期间印刷困难,未能面世。从开始写作到发表,前后经过了九年时光。这篇论文,对纷繁复杂的史料做了细密的校勘排比,把困惑学界多年的一个疑难问题梳理得清清楚楚,在清晰处理文献的基础上,通过“以史证诗,以诗补史”的方法,对花蕊夫人《宫词》的作者及其作品真伪问题做了精细的分析考证,非常漂亮地解决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。

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发表于1954年。屈原的出生年月日,向来是文史学家聚讼纷纭的问题,二千多年来,一直有不同的说法。分歧点主要在于对《离骚》“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”二句的解释不同。王逸认为“摄提”是“摄提格”的省称,屈原生于“太岁在寅,正月始春,庚寅之日”,即寅年寅月寅日。朱熹则认为“摄提”是星座名,并不说明年份,这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。王逸之说较为流行,但各家又因所据历法不同,而各自得出不同的结论。现代以来,郭沫若用“岁星纪年”法推算,考定屈原生于楚宣王三十年(前340)正月初七,这一说法曾一度得到学界一些学者的认可。浦江清先生从1948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,经过细密的分析思考和天文学推演,他找到了让历代学者迷惑的关键点,而采用了更为科学的“木星周天密率倍数”的方法推算,推定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(前339)正月十四日。迄今为止,这是公认的最为科学、推算最为精细的结论,被学界广泛采纳。

以上三篇论文,集中体现了浦江清先生在文史考据方面的成就,其重要性还不仅仅是解决了某个具体的学术疑难问题,更重要的浦先生

在这些论文中采用的研究方法,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。这些论文,继承了传统考据学的精神,但又引入了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,一方面,他重视文献史料;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,得力于他对历史文献的细密分析和梳理考辨。另一方面,他更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,尤其对屈原生年月日这个在历史上聚讼纷纭、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,他通过科学的天文观测推演和数学计算,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。这类问题的解决,得力于他在天文历法和数学计算方面的深厚造诣。正是这一方面的努力,开辟了一种新型文史考证之学的治学路径,使得浦先生的文史考证明显不同于传统考据学,可以说这是以现代方法改造古典考据学的绝佳示范。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:“浦先生的著作,可以说是少而精的,特别是他的三篇学术专文:《八仙考》、《花蕊夫人宫词考》、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,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少有的精品,在学术史上是永远站得住的。特别是这三篇文章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和治学途径,更值得为后来者思考、琢磨。”(《清华学风应作进一步具体探索》,载《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》,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4)

除了致力于文史考据之学,浦江清先生还有长期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,在古典文学的研究讲解方面同样非常渊博,诗词、古文、戏曲、小说无一不通,且都有很深的造诣。这从本书所选的其他一些文章可见一斑。

本书选录浦江清先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九篇,分为四组编排。

第一组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、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、《曲律与宫调》,这是浦先生最有分量的三篇文章。前两篇是学界公认的经典名作,《曲律与宫调》本是浦先生的学术笔记,生前没有发表,经浦汉明教授整理,分上、下两篇在《文史》2001 年第 3 辑、第 4 辑上连载。本书选录时把上、下两篇合为一篇,其他未作调整。这篇读书笔记是浦江清先生 1942 年从上海赴昆明途中困守屯溪借住隆阜徽州女中时所作,当时时局紧张,路途阻隔,浦先生胃病发作,且经费告罄,种种困苦,不一而足。先生在这样困难的情境中,仍然没有放弃学问,当时徽州女中图书馆正在晾晒图书,先生借得《万有文库》本朱载堉《乐律全书》等,自七月十七起阅读并作笔记,八月十八日记毕一册,题名《朱载堉〈乐

律全书》》。后又记第二册，题名《乐律与宫调》。这就是这篇学术笔记的由来。本书选录此文，既是考虑其学术上的意义，同时也是为了使后人了解前辈学者治学的艰辛和对学术的专注。关于这篇文章的始末，可以参看本文所附浦汉明教授的整理后记。

第二组《词的讲解》、《论小说》、《〈三国演义〉的虚与实》等三篇，体现了浦先生对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。《词的讲解》，发表于1944年，这是体现浦先生词学研究水平的一篇长文，原计划从五代到南宋选若干代表作品，一面逐句讲解，一面阐明词的体例、声律的源流演变，不久即因抗战胜利、西南联大各校准备复员而搁笔，只写到温庭筠为止。他主张采用精读的方法，对作品作细密的分析，他说：“从前人说诗词不能讲，只能体会，这些个地方真是如此。但从前人说不能讲，因为不肯下分析的工夫，假如我们肯用一点分析的工夫，未始不可以弄明一点。”又说：“古人认为诗词只可以意会而不能求甚解者，因为诗词的语言是特殊的，需要读者特殊的修养。现代的诗学理论家以及从事于形而下的文法、修辞、章句的分析者，用意即在帮助读者的修养。”在《词的讲解》这篇长文中，他分“考证”、“讲解”、“评”三部分对相传为李白所作的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两首做了精细解读，而以讲解为主。关于这两首词是否李白所作，一直是学界至今未能取得共识的问题，肯定者和否定者各持己见，莫衷一是。浦先生在本文中做了有根有据、合情合理的考证分析判断，结合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分析，否定了李白所作的陈说，论证精密，结论有力。这篇文章，从面世就一直受到学界激赏，朱自清、吕叔湘等诸位先生都盛赞其“讲解之精”。《论小说》发表于1944年，全面讨论小说的名称、实质、小说与其他通俗文艺的关系以及小说史发展的大致走向等相关问题，体现了浦先生对小说史的总体把握，可以看做是一个大略的小说史纲。《〈三国演义〉的虚与实》是浦先生的遗稿，生前没有发表，经浦汉明教授整理收入《无涯集》，2005年出版。本文讨论《三国演义》的虚实问题，涉及史书和小说的关系、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过程以及小说的艺术表现问题等。

第三组《宋元话本》、《元人杂剧的兴起》、《李渔戏剧评论及其喜剧创作》三篇都选自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。浦先生生前在清华

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多年,曾经听过课的学长,很多人都回忆过浦先生文学史课堂的风采,不免令人对浦先生的讲课发生无限倾想。可惜浦先生生前未出版过文学史专著,长期以来,大家对浦先生讲述文学史的风采也只能是倾想而已。好在 2007 年浦汉明和彭书麟教授将浦先生的文学史讲义整理出版了,这不仅为学术保留了重要的资料,更让后人能够通过书本上的内容大致领略浦先生文学课堂的精彩。《宋元话本》选自《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·宋元部分》第八章,3.5 万字左右的篇幅,从小说的起源一直讲到宋元话本的成就,非常精炼充实,其实就是一部简明宋前小说发展史。《元人杂剧的兴起》选自《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·宋元部分》第九章,2 万多字,也是从中国戏剧的起源讲起,同样体现了浦先生对中国古代戏剧史的卓越见识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《宋元话本》和《元人杂剧的兴起》在讲述中国古代小说、戏剧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时,十分明确地把相关问题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加以观察,分析特点,探讨问题,阐述发展规律,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,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讲述文学历史的现代化意识,不能不让人惊佩其文学史意识的高明。《李渔戏剧评论及其喜剧创作》选自《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·明清部分》第六章第二节。浦先生的曲学一直享有盛誉,但他讨论古代戏剧的正式论文却不多,许多精彩见解后人已不能了解,好在他的文学史讲义中可以大略看到他在戏曲研究方面的一点面貌。限于篇幅,本书只能节选有关李渔的一节。关于李渔的研究,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曾经热过一阵,但在 1950 年代以前,却并不受人关注,李渔的名声也不怎么好。浦先生五十多年前的讲义就设专节讲述李渔的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,不受当时主流学风的干扰,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立场,这种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第四组三篇文章,都是学术评论性短文。浦江清先生写过相当多的学术评论和书评,这些文章同样涉猎广泛,而且也体现了浦先生学术思考的敏锐和深刻。这里选了三篇,以见其一斑。《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》选自《浦江清文史杂文集》,《评〈元词斟律〉》选自《浦江清文录》,《悼吴瞿安先生》原文发表于 1942 年,《戏曲》月辑第 1 卷第 3 期,由浦汉明教授提供。

本书在编选过程中,得到了浦先生高足程毅中老师和白化文老师的关心和帮助,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浦江清先生的女公子浦汉明教授,她给了我最大的帮助,为本书提供材料,提供浦先生的签名和照片,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,凡我碰到问题向她求助,都能完满解决。她还专为本书提供了《浦江清先生年谱(简编)》修订本,供我改编为《浦江清先生学术年表》。这都是要特别表示感谢的。

张 鸣

2010 年 8 月 10 日草于酷暑中

2010 年 9 月 28 日改定

目 录

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(代序)	陈平原(1)
前 言	(1)
花蕊夫人宫词考证	(1)
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	(48)
乐律与宫调	(76)
词的讲解	(111)
论小说	(133)
《三国演义》的虚与实	(144)
宋元话本	(149)
元人杂剧的兴起	(189)
李渔的戏剧评论及其喜剧创作	(213)
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	(224)
评王著《元词斟律》	(233)
悼吴瞿安先生	(241)
浦江清先生学术年表	(243)

花蕊夫人宫词考证

附官词校定本

谈中西文学之比较者，每以中国无长诗为憾，如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秦妇吟》等不过千数百字，殊不足与西洋之长诗比拟。此非中国诗人才有所短，可以两点解释之。一者文学之传统中西互异；二者诗之范围亦不全同也。言传统异者，欧洲文学托始于荷默之史诗，继之者为希腊人之诗剧，皆长篇巨制；亚里士多德所谓诗即指史诗与戏剧而言。故西洋诗人为继承此种传统精神，莫不倾心于长诗之创造。若中国诗歌则导源于三百篇，三百篇者，周代之乐章，皆短篇也。夫源既不同，其后之流派遂别；李杜不为长诗，因无长诗之传统故耳。言范围不同者，中国所谓诗，只是韵律文之一部分，其长篇巨制，若《楚辞》中之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，汉赋中之《上林》、《子虚》，以及后世之弹词、戏曲，皆别名之曰骚，曰赋，曰弹词，曰曲，而不称之为诗。若以西洋文学之定义言之，则此骚、赋、词、曲皆可入长诗之范围焉。

诗体之兴，不免依附于乐府歌曲，汉乐府虽有篇幅较长者，乃其后此体不见发展。唐代为诗之黄金时代，考其时宴会之席，歌唱五七言绝句，乃诗体中之最短者。如李白之拟古乐府，杜甫、白居易之新乐府，在当时实未入乐，但供吟诵而已。惟绝句虽云短小，唐诗人中颇有利用联章之办法，以尽其纵横驰骋之诗才者，如王建之《宫词》，罗虬之《比红》，胡曾之《咏史》是已。余读王建《宫词》，始悟中国诗人，原可以小诗之体制，发挥长诗之作用。《宫词》虽不创始于王建，但连用七绝百首之例，则自彼开之。观其描绘之细腻，遣词之新颖，用乐府通行之体制，寓史家纪事之笔墨，真一代之作家也。其后，蜀之花蕊夫人，宋之王珪、徽宗皇帝数家，皆以建为矩矱。元明以后，作者尤繁，难为偻指，惟往往缺乏耳闻目见之材料，徒摭拾史乘中之宫闱琐事以为题咏，已近于咏史诗之性质，虽词章笔力尚有可观，论精神面目则去仲初、花蕊辈已

远；亦不足与此两家媲美也。^①

王建、花蕊两家，最为世所传诵；建之笔力高超，花蕊已伤纤弱。惟建官在外廷，其所歌咏，不无想象之词，不若花蕊夫人，以宫中之主人，咏宫内之实事，自更有亲切之意味。余于王建宫词，旧思作注，久而未就。近读花蕊《宫词》，不无心得，自谓可以解千古之惑，乃先为此考证，而以《宫词》之校定本附焉。

一 前人之旧说

依前人之旧说，花蕊夫人者，后蜀主孟昶（九一九—九六五）之妃，自北宋以来，此为定案。惟或云姓费，或云徐氏，至《全唐诗》之编纂时，尚存疑问。今考《宫词》虽为五代蜀国之作，但其写本实为北宋熙宁五年（一〇七二）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校书于崇文院时所发见，遂为传布于士大夫间。余所见明仿宋本花蕊夫人《宫词》^②，前有王安国之序，其文如下：

蜀花蕊夫人宫词序

熙宁五年，奉

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馆者，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。其书多剥脱，而得二敝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，书乃出于花蕊夫人手，而词甚奇，与王建《宫词》无异。建自唐至今读者不绝口，而此

^① 明黄省曾有《四家宫词》，林志尹有《历代宫词》，毛晋有《三家宫词》，又有《二家宫词》，清朱尊彝有《十家宫词》，以上皆汇刻宫词著名者。《香艳丛书》内有清人宫词多种，今附记于此：《南宋宫词杂咏》百首，上海赵棻仪佶著；《冬青馆古宫词》三百首，乌程张鉴秋水著；《宫词》八十首，长洲徐昂发大临著；《天启宫词》，秀水蒋之翫楚穉著；《启祐宫词》，侯官高兆固斋著；《天启崇祐宫词》，贵池刘城伯宗著；《十国宫词》，秀水孟彬赋鱼著。其余清人所作宫词之有单刻本者尚多，今不备举。

^② 余所见明仿宋本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，乃季苍苇旧藏，编入季氏之《全唐诗》稿本中者。郑西谛定为万历刊本，观其序文诏字提行，尚存宋本之旧，故曰明仿宋本。今归中央图书馆所有。

独遗弃不见取，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，甚为可惜也。谨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，而口诵数篇于左相王安石，明日与中书语及之^①，而王珪、冯京愿传其本，于是盛行于时。花蕊者，伪蜀孟昶侍人。事在国史。王安国题。

观此序诏字提行，知此明本实依宋本之旧。宋人之刊印花蕊《宫词》者必有一本为此明本所依袭。惟此序真为安国亲笔否，则不可知；因序文大意亦见于宋人笔记中，谓安国曾为《宫词》作序固可，谓宋书肆中人取时人笔记中语，伪为此序以炫读者亦无不可。^②但无论出安国亲笔与否，凡序中所云，皆符合史实，今据宋史以考，安国曾为崇文院校书及秘阁校理，而熙宁五年时，王珪、冯京皆以参知政事在中书省也。王安国有孟昶侍人之语，惟不曾明言姓徐抑姓费。彼云“事在国史”，疑当

① 文意谓安石与中书省中人语及之。时王珪、冯京皆以参知政事在中书省。

② 王安国同时人释文莹之《续湘山野录》云：“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，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。其书多剥脱，而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。书乃花蕊手写。而其词甚奇，与王建《宫词》无异。建之词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，而此独遗弃不见取，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，甚为可惜也。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。既归，口诵数篇与荆公，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，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，于是盛行于时。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，凡三十二章，因录于此。（下略）”平甫安国字；禹玉，王珪字；当世，冯京字。此与仿宋本序文大致相同。又南宋初年人胡仔之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四十：“王平甫云，熙宁间奉诏定蜀楚秦三家所献书，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共三十二首，乃夫人亲笔，而辞甚奇，与王建《宫词》无异，自唐至今，诵者不绝口，而此独遗弃不见取，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，甚可惜也。谨令缮写入三馆而归口诵数篇于丞相安石，明日中书语及之，而王珪、冯京愿传其本，于是盛行于世。夫人伪蜀孟昶侍人，事具国史。（下略）”设王珪、冯京传出宫词，而平甫为之作序，自宜用禹玉、当世字，不应直斥其名，且“于是盛行于时”当作何解，岂平甫作序时，即已盛行于时耶？余观此万历仿宋本所录花蕊《宫词》，多不可信；此序非窃自他本，即出南宋书肆中人取时人笔记所言伪为之。惟当王安国以《宫词》缮写入三馆时，其前必作题识，若王珪、冯京传抄《宫词》，当亦请平甫略记数语以识颠末，文莹辈所记自是摘录其大意如此，至平甫亲笔如何则不可知矣。最谬者，毛晋《三家宫词》即以此序文截去数语作为题跋，灭去王安国之名，使人竟不知此奉诏者为何人。毛氏此跋有“熙宁五年”之语，非出《湘山野录》及《渔隐丛话》，当曾见有此序文之《宫词》旧本也。

时宋史馆中有此孟昶侍人之史料，其后乃遭删弃，故今本《宋史·孟昶传》中绝无夫人之事迹。正史中既无可考，此人之事迹乃杂出于诗话笔记，经过若干人之渲染，构成一有味之人物。

北宋陈履常《后山诗话》云：

费氏，蜀之青城人，以才色入蜀宫，后主嬖之，号花蕊夫人，效王建作《宫词》百首。国亡，入备后宫，太祖闻之，召使陈诗，诵其国亡诗云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，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太祖悦。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耳。

此费氏说之最早者。观此，知夫人于孟蜀亡后，随昶至汴，纳入宋之后宫，于太祖前诵亡国之诗，寄哀愤之感。宋人又记此人入宫以后，颇为太祖所溺爱，几中其复仇之谋，终为太宗所射杀。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云：

国朝降下西蜀，花蕊夫人随昶归中国，至且十日，召入宫中，而昶遂死。昌陵（指太祖）后亦惑之，尝造毒，屡为患，不能遂。太宗在晋邸时数谏未能去。一日从上猎苑中，花蕊夫人在侧，太宗方调弓矢引满拟走兽，忽回射夫人，一箭而死。

据同时人王巩所记，则太宗所射杀者，乃金城夫人。巩之《闻见近录》云：

金城夫人得幸太祖，一日宴射后苑，上酌巨觥以劝太宗，太宗固辞。上复劝之，太宗顾庭下曰：“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，乃饮。”上遂命之。太宗引弓射杀之，即再拜而泣，抱太祖足曰：“陛下方得天下，宜为社稷自重。”上饮射如故。

此金城夫人亦不见于正史，无可稽考。清人俞正燮（理初）乃为之说曰：“宋之金城夫人即孟蜀之花蕊夫人”^①，俞氏非别有所据，恐即见此不同之记载而为猜测之论断耳。

南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始辨夫人姓徐，不姓费氏。

蜀伪主孟昶纳徐匡璋女，号花蕊夫人，言似花蕊翻轻，又升号

^① 见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卷十二“书《旧五代史》僭伪列传后”；下文引俞说并同。